

语言经济学的成长*

苏 剑¹, 张 雷²

(1. 山东大学 经济研究院, 济南 250100; 2.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 要: 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发展起来, 语言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采取的方法、研究现状、研究方向却为人们所漠视。本文把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代进行综述, 阐述语言经济学每一代所研究的问题以及各代之间的联系; 最后讨论了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是否能具有统一的范式和可操作的技术路线, 以使这门学科的学术研究具有更强的规范性。无论怎样, 语言的重要性和经济学方法的灵活性将会使语言经济学迅速发展。

关键词: 语言经济学; 人力资本; Q 值; 语言距离; 公共产品; 成本收益核算; 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
中图分类号: F06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8131 (2010) 04-0037-0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guage Economics

SU Jian¹, ZHANG Lei²

(1.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Anhui Huaibei 235000,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economics as a discipline has been developed, however, the problem that the language economics studies; the approach to the study and the status of research are ignored by the people. The author divided the language of economics into four generations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that every generation of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studies and stated the links among the generations. This paper concluded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whether the problem has a unified paradigm, and operational technical line to make the discipline of academic research have a stronger normative. Certainly, the importance of the language as well as flexible approach about economics will enabl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Key words: language economics; human capital; Q value; language distance; public product; cost benefit checking;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regulation

一、引言

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主要源于语言是一种交流的媒介, 正如维森(2001)所讲, 语言构成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主要维度, 不了解语言, 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 显然难能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内在秩序及其变迁机理有一个到位的理解和把握。对语言的关注不仅是逻辑学的本质、语言学的内核, 也为经济学者所重视。经济学者关注语言的问题历史十分悠久, 一方面在于语言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在于经济学方法与工具的特殊性和灵活性。亚当·斯密于 1761 年发表在《哲学随笔》杂志上的一篇题为《对语言最初形成以及原初和复合语言的不同天赋(different generations)的思考》的论文成为以后经济学家研究语言的开始; 他在《国富论》对语言的重要性也有大篇阐述, 并明确指出人的交易是需要语言的,

* 收稿日期: 2010-05-04

作者简介: 苏剑, 男; 博士研究生, 在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学习; 主要从事语言经济学与人力资本理论研究; Email: 5285889@163.com。

张雷, 女; 助教, 在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

“从来没有看到一只狗与另一只狗进行公平的、有意识的骨头交易”（转引自鲁宾斯坦,2000,p35）。在这些著作之后，吸引了许多经济学者关注语言问题。但以上研究还只能是作者零星想法的阐述，并没有深入研究语言的经济势能，仅仅局限于概念的提出与简单层面的描述，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语言经济学有了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为 Jacob Marschak（1965）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value)、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收益(benefit)，因此，他认定经济学与探求语言方面的优化具有密切关系。虽然他没有深入研究语言与经济的关系，只是提出了语言经济特性的概念，但是这一思考为经济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关注语言问题提供了新鲜的土壤，也为语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到先驱性的作用。

语言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源于 Grin Francois(以下简称 Grin)的研究。Grin（1996）认为语言经济学主要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变量来测度其对经济的作用，并在研究的过程中采取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从此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方兴未艾。Grin（1996）一篇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综述文章对语言经济学的拓展有实质性的作用。前期学者为 Grin 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有必要对 20 世纪 60 年代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进行梳理，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有益的借鉴。国内学者也有对语言经济学综述的文章，最典型的是张卫国。张卫国（2008）把语言归纳为三大命题，即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这一综述较为全面深入地揭示了语言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本文不是对以上学者的研究的重复。语言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尤为欠缺，是因为数据的不可得性，这也限制了语言经济学科的可信度与普及度。因此，本文将介绍语言 Q 值的概念（它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与工具）；同时，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来论述语言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语言经济学没有统一的主题，往往在特殊时期集中研究某个流行的话题。笔者把语言经济学的进展分为四代，研究这四代研究的主题以及代际之间的关系。此外，由于语言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的复杂性，其并没有遵循统一的范式，也没有统一的理论基础，因此本文也就语言经济学的同一性做出了讨论，并对语言经济学能不能纳入统一的范式进行研究进行探讨。为了完成以上任务，本文首先阐述语言经济学的四代：

一是论述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经济学发展背景下的语言经济学，笔者把这一时期归为语言经济学的第一代。这一时期的实证研究比较多，这些实证研究往往出现在移民国家，一个核心的问题是移民如何迅速融入当地社会，语言是影响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变量。

二是阐述语言经济学研究很重要的一种工具与方法——语言 Q 值。语言 Q 值也能为语言政策、语言规划以及语言推广的成本与收益核算提供一个重要的工具，笔者把这一时期归为语言经济学的第二代。

三是介绍语言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这里面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比如两个国家语言距离（language distance）的远近是否是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这是语言经济学的第三代，主要文献集中在 20 世纪末期。

四是阐述 21 世纪初最流行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成本收益核算，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研究。对一个国家的语言教育以及官方语言的设定、语言的国际推广和本国濒危语言的保护都涉及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对以上问题进行测度和研究不仅是这一时期的流行话题，也是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话题。用经济学的方法与工具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为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工具和参考。笔者把 21 世纪初期语言经济学的流行话题归为语言经济学的第四代。

二、语言经济学滥觞何处

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诞生与发展，催生了语言经济学，语言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的研究如雨后春笋，主要出现在西方移民国家。目前该领域作为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分支已趋成熟，大量的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这一时期可以作为语言经济学的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为 Chiswick、Miller、Dustmann、Lobodan、Fabbri、Shields，其中有突出贡献者为 Chiswick。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Schultz 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随后 Gary S.Becker（1965）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一方面催生了教育经济学，另一方面也为语言经济学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土壤。Schultz、Becker 等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为现代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认为，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式，它体现在人的身上，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的形成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连续的作用。这一论点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许

多教育经济学著作的理论出发点。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也为语言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主要源于语言投资需要教育来完成。另外语言作为人力资本是符合人力资本的三种属性的。因此 Becker 的学生 Chiswick 在人力资本的框架下，以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为基础，论证了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他对一些移民国家做了大量实证研究，认为语言是影响移民与当地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比如 Chiswick 和 Miller(1992,1995)构建了一个模型，认为语言的熟练度与经济激励 (economic incentives)、移民与土著的接触程度 (exposure) 有正相关关系；Chiswick 和 Miller(1998)修正了上述模型，认为移民对土著语言的熟练度与在目的地定居时间 (duration in destination) 和移民的年龄 (age at migration)、教育水平成正比 (education)，与少数民族语言集中度 (minority language concentration) 成反比，但是语言的熟练度与移民前后有无孩子 (children)、居住地 (location) 及故居地 (country of origin) 的关系是含混不清的。

总结上述研究，英语的熟练度与经济激励、与目的地语言的融合程度、获得语言能力的效率成正比，而与教育水平和定居的持久程度以及移民的年龄成反比；孩子在家庭中对成人的英语能力有正面的影响，这主要源于孩子一开始就接触了土著语言。

许多经济学者除研究影响语言熟练度的因子外，还探讨语言的熟练度与个人的工资收入分配的关系，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验证语言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熟练度是影响移民工资收入分配的重要原因，移民要想很快融入当地居民的生活必须提高自己语言熟练度。在如何提高语言熟练度方面他们也给出了相关的建议，如年少时移民要比年老时移民更容易掌握土著居民的语言。这些研究的贡献是提出了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只局限于少数移民国家之中，其数据也是来自于对少数移民的问卷调查和电话采访，并没有为语言经济学这一学科构建理论基础。我们只能说把语言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中有助于语言经济学者更深一步的研究，语言作为一种变量在影响移民的收入分配时是显著的。个人想要到英国、美国留学和工作，必须在雅思或者托福等语言资格考试中达到一定的水平，这样的语言政策正是在语言经济学理论的实践。移民要想融入当地社会，必须先学会当地语言，以保证其与当地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小，保持社会的稳定性。第一代语言经济学为这些制度安排的高效率性以及移民国家的经济均衡发展做了重要指导。

三、语言的生与死：语言动态研究

笔者把这一时期看作语言经济学发展的第二代，其研究主要集中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 Deswaan、Breton、Grin Jeffrey 和 Reksualk 等。Church (1993) 探讨了双语与网络外部性的问题，认为语言具有网络外部性，随着对某种语言学习人数的增多，选择学习此种语言就会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当人们学习这种语言面临高额的成本时，则学习此种语言的决定是低效率的；他最后得出语言政策一般会偏向于大民族语言的结论，即政府一般对大民族语言实行补贴。Deswaan (2003) 根据语言的使用人数和语言的中心度构建了语言 Q 值模型。语言的 Q 值指的是对某一个社区里的各种语言价值进行排序。 Q 值理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必要对 Q 值模型进行介绍，它是语言经济学重要的有效的分析工具。

对于某个语群 S 中的 λ_i 语言使用者来说，语言的交际价值 Q 值可以用 Q_i 表示：

$$Q_i = p_i * c_i = P_i / N^s * C_i / M^s$$

其中 p_i 表示 λ_i 语言的流行度，它等于 S 语群中 λ_i 语言使用人数 (P_i) 除以 S 语群中所有语言的使用人数 (N^s)，语言的中心度 (c_i) 等于操 λ_i 语言的多语使用者人数 (C_i) 除以 S 语群中所有操多种语言的人数 (M^s)，它表示 λ_i 语言与 S 语群中其他语言的联系。这样得出 Q_i 值就是 λ_i 语言在整个语群中的地位。利用此公式，计算出在中国社区中汉语^①的 Q 值较高，大约为 0.53，远远高于本社区内的其他语言^②。汉语 Q 值最高主要是由汉语的流行度决定的，因为说汉语的人数很多。因此，要想成功地融入中国这个语群之内，人们应首先学习汉语，因为汉语的 Q 值最高，它具有很高的交际价值，人们在贸易中使用汉语要比使用其他语言更能节省交易成本。同时，我们也可得知推广普通话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上讨论只是局限在一种语言，若社区内有多种语言，人们应该学习哪一种？人们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纷纷追求双语学习，甚至多语学习。那么，人们选择了一种语言学习后，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接下来会投资于何种外语？就像中国人在学习汉语之后，应该选择何种语言作为第二语言，甚至第三语

①这里汉语是指普通话，下同。

②在中国社区之内，存在着 80 多种语言，其中以说汉语人数最多。

言？有人会世界流行的角度给出学英语的答案。但这种想当然的答案是不正确的，反例亦可很简单地举出：假设在中国有 1 万法国移民，而会英语的移民的数量为 1 千，那么选择法语作为第二语言投资要比选择英语作为第二种语言投资要具有更高的交际价值。其原因可用下面的公式（即 Deswaan 对 Q 值的算法做的一个简单修正）来解释（S 语群中某种言语库的 Q 值）：

$$Q_j^s = p_j * c_j = (\sum f_k / N) * (\sum f_i / M^s)$$

$$f_k \text{ 要满足 } \rho_j \cap \rho_k \neq \emptyset; k = 1, \dots, 2^n$$

$$f_i \text{ 要满足 } \rho_j \cap \rho_i \neq \emptyset; m \geq 2; i = 1, \dots, j \dots 2^n$$

其中言语库 ρ_j 的使用人数为 f_j ，与 ρ_j 至少共有一种语言的言语库为 ρ_k ，使用人数为 f_k ，S 语群中总使用人数为 N^s 。此时的 Q 值也是由两个要素构成：其一为流行度，是可以给用给定言语库中的语言直接与之交际的人占语群人数的比例；其二为中心度，表示能将该言语库中某个语言与其他语言联系起来的操多语者的人数，也即其在语群所有操多语者中所占的比例。

人们纷纷学习 Q 值较高的语种，却带来了 Q 值较低语种的存在问题。Deswaan 只是简单地阐述，并没有深入探讨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问题，对少数民族言的保护措施也没有提出可行性的建议，这也为以后的语言经济研究提供了缺口。我们可以利用 Q 值理论模型解释人们投资某种语言的原因，也可以利用 Q 值理论讨论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问题。Deswaan 的理论模型可以作为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的工具，其原因我们将在最后进行讨论。

此外，Grin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建立了一个效用最大化模型来分析少数民族语言存在的边界值，并讨论了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区边界，认为少数民族语言应该而且是可以存在的。少数民族语言保护主要取决于种群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时间、语言态度 (language attitudes) 以及情感等。Michael Reksulak (2004) 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经济发展与单词增长或者废弃之间的关系。Grauve(2006)用全球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是当人均收入增加 1% 时，语言种类将会降低 0.23%。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得到经济发展使语言趋同的结论。那么自然就有了语言保护的问题，语言要不要保护，如何保护，这些都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语言动态研究作为这个时代研究的主题，其研究成果一方面是人力资本的延续，比如说 Deswaan 的 Q 值理论也是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研究。另一方面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呈现趋同之势，通用语言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必然使世界上的语种呈现缩减趋势。但是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又具有多元性，比如说英语虽然是超中心的语言，但始终没有成为世界统治语言，德语和法语就可以和英语分庭抗礼。文化的多元性也反映出一种语言的消亡需要很长时间。语言趋同已成为必然之势，能否在文化的多元性和趋同性中寻找语言收敛路径，这是语言动态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今后语言经济学者的一个切入点。

四、语言与国际贸易：类比于货币汇率的语言距离

通用语言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贸易的成本，这一结论是公认的事实，但是细化语言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可以有许多问题值得思索。因此，语言与国际贸易研究成了语言经济学家在世纪之交比较流行的话题，我们把这一时期看作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第三代。

例如：英语作为全球超中心语言，它是否比其他语言更有效地促进国际贸易？通用语言在国家内部的重要性如何？一个国家语言的多样性是否会降低国内贸易效率？读写能力 (literacy) 强是否可以提升国际贸易？语言学上的语系分支 (language tree) 和语言经济学上的语言距离 (language distance) 是否相同？两国语言距离的远近如何影响它们之间的贸易？如何把语言变量引入规范的国际贸易模型中？这些都是分析语言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的突出问题，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值得研究的。许多经济学家在世纪之交涉猎这些方面的研究，最典型的是 Melitz，他把语言引入一个 Gravity Model 中，结论非常明显：直接的语言交流和通过翻译网络间接交流都可以促进国际贸易。他通过实证证明英语作为全球的超中心语言并不比欧洲其他的主要语言更有效地促进国际贸易，但欧洲主要语言作为一个群体要比其他语言更有效地促进国际贸易；

读写能力的提高对提高国际贸易 1% 的贡献是以降低 3% 的国内语言种类为代价的。Melitz 的研究是继承了 Boisso 和 Ferrantino (1997) 把语言定量化为一种指数的思想, 并将其引入规范的经济模型而得到的结果。

此外, 大量的语言学文献揭示出语言分属于不同的语系和语族, 语言距离的远近主要取决于不同语系和语族, 比如阿尔泰语系和乌拉尔语系分属不同的语言分支 (language tree), 它们的语言距离 (language distance) 是比较远的。Hart Gonzalez 和 Lindemann (1993) 列出了国际上 43 种语言与英语距离的评分, 分数越高者与英语的距离越远。具体的做法是选取说英语的美国人, 对他们进行 16 周到 24 周的语言培训, 然后进行测试评分, 其实验的结果为后来者继续语言与国际贸易的研究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数据。在他们之后, Chiswick 和 Miller (2004) 拓展了这种实验结果的应用, 它可以有效地测量出非英语国家的移民去美国或者加拿大的英语熟练程度。当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两国语言距离越远, 那么移民对土著语言熟练水平越差。如果由瑞典来到了日本, 对英语的熟练程度将可能降低 17%, 因为日语与英语的距离是十分遥远的。Hutchinson (2005) 验证了语言距离在双边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语言经济学已经引入了“语言距离”的概念, 这里的语言距离类似于汇率。不同国家所采用的货币不同, 国际贸易需要用汇率进行折算; 国与国之间的语言也是不同的, 语言距离又在国际贸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那么语言距离就可以类似于汇率, 成为一种语言为别的语言所表示的价格。

这一时代主要探讨语言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并把语言作为一个变量引入规范的经济模型中, 那么语言在模型中如何度量? 这是语言经济学的一个难题。在这些模型中, 语言不再是虚拟变量, 而是用实验的方法对语言进行定量分析, 即定量化为一种语言指数, 把语言指数引入模型中。所以, 此时的研究比将语言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的研究前进了一步。前人通过实验对语言进行量化, 这是对语言经济学的贡献; 后来的学者有必要把这些结果整理成数据, 为以后相关的研究提供数据上的支持与借鉴。

五、语言政策的评估: 成本收益分析

语言经济学应采取宏观总量分析还是微观个量研究,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很明显的, 应是兼而有之。比如用俄语翻译的和用德语翻译的同一本书籍, 它们的价格会不同, 这是不同语言在不同的环境下的供给成本问题, 是偏重于对语言的微观研究。而对语言政策的评估则属于对语言的宏观经济研究。我们知道无论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 还是一种公共产品, 最后都落脚于语言规划或者说是语言政策。从经济学的视角关注语言政策, 一般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和福利分析。对语言规划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是 21 世纪初语言经济学的流行话题, 也是语言经济学发展的第四代。一些经济学者的先驱性的工作是瞩目的, 在 20 世纪 90 年代, Church (1993) 用网络外部性理论阐述了双语的竞争力, 并对一个社区所采用的语言规划或语言政策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 认为一国的小民族的语言终将被大民族语言所同化吸收, 因此官方的语言政策应对大民族语言实行有效的补贴。随后围绕着语言规划成本与收益的核算有了更多的研究, 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有 Grin (1999, 2002), 他采用成本与收益分析的方法对威尔士、爱尔兰、瑞士等国家或者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进行评估, 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同时 Grin (2008) 又命名了语言教育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education)。语言政策或者语言规划是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但是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行事前效果预测和事后收益与成本评估, 以此修正语言政策, 则是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但是其难度是非常大的, 一项语言政策的出台, 很难度量其成本与收益, 只能进行大致的估算, 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语言种类繁杂的国家。比如当今流行的汉语的国际推广, 对于语言推广的成本, 我们具体追踪到每一个环节, 容易得出数据; 而语言推广的收益却很难得到具体数据, 只能是估算。这也是限制语言经济学实证研究的硬伤所在。

以上主要是研究语言的经济势能, 分为四代, 前三代主要是把语言纳入人力资本框架来研究, 其研究成果在技术工具上是递进的。第一代只是把语言看做一种虚拟变量, 引入 OLS 模型进行计量验证, 实证结果显示语言作为解释变量是显著的, 但是这些模型是静态的模型, 也是简单的, 难点在于搜集调查数据。第二代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也是把语言纳入人力资本的框架, 比如说人们选择 Q 值较高的语言投资是因为掌握 Q 值较高的语言可以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 以便就业有多层次的选择。这一时期一个突出的进步是其模型是动态的, 主要的实证结果可以探讨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区间以及语言的生与死的阈值。这些理论模型运用了经济人的假设, 把个人的语言活动与语言投资纳入一个规范的效用最大化的模型。第三代的语言经济学, 不再把语言看作一个虚拟变量, 而是采取实验的方法把语言定量化为一种指数, 并引入经济学模型中, 其意义是显著的, 把语言测度为指数来研究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经济势能, 是一大进步。第四代的

语言经济学更接近社会语言学，无论是把语言定性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还是其他，最后都要为一国的语言制度安排服务。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是 21 世纪语言经济学最流行的话题，从经济学视角分析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意义尤为明显，语言政策的事前估计和事后调整，都需要采用经济学的方法测度其收益和成本，从而选择适合本国的语言政策。

六、讨论

在前文的综述中，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比较复杂，表面上看没有统一的主题，并且各个主题都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和研究方法。实际上语言经济学主要围绕两方面来研究：一方面把语言看做一种人力资本。这类研究偏重于微观研究，如个人进行语言投资以及二语教育的选择，涉及单个语种的吸引力和中心度以及投资这种语言所要花费的教育、培训、书籍等成本。另一方面围绕语言规划的成本收益核算展开。这主要是宏观研究，一个国家选择几种语言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要根据所选择语言的种类给国民交易或者国际交易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来确定。语言经济学关于微观层面的研究和宏观层面的研究，两种研究思路是有联系的，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还是一种公共产品，最终要落脚于语言政策。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所以中国推广普通话的语言政策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并不是所有国人都会讲普通话，不会讲普通话，一笔交易就很难完成，可见语言在交易中具有人力资本属性；同时，推广普通话必须由政府来完成，因为语言也具有公共产品属性。

此外，笔者认为可以用 Q 值作为工具变量把两者联系起来。个人在选择何种语言进行二语投资时，一般选择 Q 值较高的语言，因此一个国家实施本国的语言推广政策时，最关键的是不断提高本土语言的 Q 值，使本土语言成为一种强势语言。而人们在接受二语教育时，投资 Q 值较高的语言，可能又是对本民族语言的一种威胁。那么要不要实施语言保护政策，也就成了语言经济学的重大课题。

通过以上的讨论，笔者认为 Q 值理论能够把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各个主题联系起来，以后的语言经济学者应该力求完善语言的 Q 值理论，进而建立语言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形成一个统一的范式，这样语言经济学这门科学才具有生命力。

参考文献（作者-出版年制）：

- [1] 埃布拉姆·德·斯旺.2008.世界上的语言（中译本）[M].乔修峰.译.广州：花城出版社.
- [2] 黄少安.2008.制度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3] 何九盈.2005.中国现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 [4] 宁继鸣.2006.汉语国际推广：关于孔子学院的经济学分析与建议[D/OL].山东大学博士论文数据库.
- [5] 舒尔茨.1992.论人力资本投资（中译本）[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 [6] 张卫国.2008.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J].经济研究，（2）.
- [7] Becker Gary, Chiswick Barry R. 1966. Educ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 and proceedings, 56(2): 358-69.
- [8] Breton Albert. 2000. The Cultural Yield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 Assimilation[M]//Exploring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Ottawa: official languages support program, Canadian heritage.
- [9] Chiswick BR, Miller PW. 1995. The Endogeneity Between Language and Earnings: International Analyse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3(2).
- [10] Chiswick BR, Miller PW. 1998. English language fluency among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J]. Research in Labor Economics, 17 (in press) .
- [11] Chiswick BR, Miller PW. 1999. Language Skill Definition: A Study of Legalized Alien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forthcoming) .
- [12] Chiswick BR, Miller PW. 2001. A Model Of Destination Language Acquisition: Application to Male Immigrants In Canada[R]. Demography, volume38 number3, Augus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 [13] Chiswick BR, Repetto G. 1998. Immigrant Adjustment in Israel: Literacy and Fluency in Hebrew and Earnings[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 [14] Dustmann C, Fabbri F, Preston I. 2000. The Causal Effect of Ethnic Concentration on Language[Z]. Mimeo,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15] Dustmann Christian, Francesca Fabbri. 2003.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Labour Market Performance of Immigrants in the UK[J]. *Economic Journal*, July.
- [16] Dustmann C, van Soest A. 1998. Language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Z].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 [17] Grin Francois. 2003. Language Planning and Economics[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4.
- [18] Grin F, Vaillancourt F. 1997. The economics of multilingualism: Overview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M]// W. Grabe, et al.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 Jacob Marschak. 1965.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J]. *Behavioral Science*, (10).
- [20] Lazear Edward P. 1999. Culture and Languag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7(6).
- [21] Lazear E. 2000. Economic imperialism[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 (1): 99-146.
- [22] McCloskey D. 1990.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23] Rubinstein A. 1999. Five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language(Unpublished manuscript)[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 [24] Vaillancourt F. 1980. Difference in Earnings by Language Groups in Quebec, 1970. An Economic Analysis[Z]. Québec: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recherche sur le bilinguisme (publication B 90).
- [25] Vaillancourt F. 1992. Language and public policy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economic perspective[M]// B Chiswick, et al. *Immigration, Language and Ethnicity.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AEI Press: 179-228.
- [26] Vaillancourt F. 1996. Language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Quebec: Measurement, findings, determinants, and policy cos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2: 69-92.
- [27] Vaillancour F, Grin F. 2000. The choice of a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The economic aspects[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Report to the World Bank Institute, Washington.

(编辑: 夏 冬; 校对: 段文娟)